

制度、思想与社会组织： 探索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新路径^{*}

王 昉 曾雄佩 许 晨

作为当今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其经济发展过程越来越受到广泛关注。中国如何由古代的领先、近代的波折走向当代的腾飞?无论是中国经济的历史表现还是近现代经济制度的变迁都吸引了诸多学者的关注,同时也存在一些争议。例如,伊懋可(Mark Elvin)、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等学者均认为中国经济在宋朝达到顶峰,然后陷入“高水平均衡陷阱”,人均GDP增长率处于停滞状态,甚至有下降的趋势。^①但李伯重并不认同中国经济明清时期停滞论,他认为江南地区在明清时期处于持续发展的态势,人均收入也并没有长期下降。^②结论歧异的原因在于长时段经济史研究容易受到史料和数据选取的限制,单纯的数字比较或史料对比都或多或少存在着片面性的问题,这也让许多研究者逐渐摒弃单纯的基于经济学或历史学的视角,试图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地理解和认识中国经济史,全球视域下的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思维框架已经在逐步形成。仍以上述人均GDP问题为例,如果不仅仅从个别的案例出发,而是考虑到全局的生活水平,如营养状况、人际交往、语言表达、社会思潮、制度供给等,可能结论会更有说服力。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从表面上看超出了纯粹经济学或历史学的范畴,但关于制度、思想和社会组织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探讨,从根本上来说则是理解历史演进的创新性解读,因而也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不少学者更加倾向于对整体社会结构、社会发展和社会演化进行反思。中国经济史研究也因此相应地呈现出三大趋势。

第一,关注长时期的历史进程,在全球视野下进行跨区域的比较研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强调:“史学家的观点愈富有世界性,愈能摆脱民族或地区的偏见,就愈接近获得有效于当代的历史观念”。^③在全球视野下进行中西方长时段的比较研究对深刻理解中国的社会经济史具有重要意义。以李中清、彭慕兰、王国斌等人为代表的加州学派在这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他们的研究打破了以往“欧洲中心论”的桎梏,将中国置于世界历史的范围之中,探究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以凸显中国历史的重要性。^④最近几年,全球视野下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例如李伯重与范·赞登通过荷兰与长三角的比较研究发现,在19世纪初期,长三角和西欧经济发展几乎处于同一水

[作者简介] 王昉,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上海,200433,邮箱:wangfang@sufe.edu.cn;曾雄佩,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200433,邮箱:zengxiongpei@126.com;许晨,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200433,邮箱:xuchen0728@163.com。

* 本文受到“上海财经大学创新团队支持计划”(立项编号:2014110309)资助。

① Mark Elvin, *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Angus Maddison, “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 *China Perspectives*, Vol. 68, No. 100, 1998, pp. 279-311.

② 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③ [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著,杨豫译:《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58页。

④ [美]李中清、王丰著,陈卫、姚远译:《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1700—2000)》,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美]王国斌著,李伯重、连玲玲译:《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和欧洲经验的局限》,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美]彭慕兰著,史建云译:《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平,1820年以后才出现分流。^① 这些研究都将长期经济表现的中外比较列为重点研究对象,将制度等因素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变量,拓展了经济史研究的范畴,加深了对于中国经济史的纵深理解。

第二,逐渐突破单一领域的经济史研究的藩篱,涌现了一大批高水平的跨学科研究成果。尽管经济史是一门交叉学科,但以往的研究往往仅关注经济学与历史学领域,近年来则出现了多学科融合的趋势。希克斯很早就倡导跨学科的交流,认为“经济史的一个主要功能是作为经济学家与政治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关于世界大事、思想和技术等历史学家——可以互相对话的一个论坛”。^② 从最近的研究可以看出,经济史研究的学科交叉日益多元化。不但关于财政史、金融史、土地史等领域的融合研究越来越多,经济史与法律史、经济思想史、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结合也非常突出。例如,林满红以白银流通作为统一的主轴,将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融合,做出了杰出的研究,也为了解世界货币史、清代政治史、清代文学史及中西政治经济思想比较提供了十分有价值的参考。^③ 科大卫融合了社会经济史、政治史、人类学等学科的方法和视角,研究了代表国家的法典条文与代表宗族的民间礼仪风俗在华南地区的相互作用,发现两者在华南地区的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皇帝”与“祖宗”渗透到了当地的礼节、身份、地位、财产权、商业习惯等行为中。^④ 跨学科的研究突破了传统经济史研究的固有框架,综合了各学科的方法,使得结论更具有解释力。

第三,基于族谱、档案、碑刻、出土文物等新史料,重视历史数据的挖掘与应用。早在20世纪60年代,在诺斯、福格尔等经济史学家的推动下,数量研究的方法被引入到美国经济史的研究中,他们用可靠的统计资料作为研究的基础,其研究被认为是对传统经济史的挑战。近年来,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也越来越重视新史料和历史数据的应用,研究者们不断从族谱、档案、碑刻、出土文物等历史资料中挖掘出数据,并利用大数据对社会经济史的诸多方面进行深入研究。例如薛华(Carol H Shiu)利用清代桐城族谱中的数据对中国古代社会流动性、家庭生育、教育投资进行了研究,发现“少生优育”不仅发生在近代欧洲,明清中国的士绅阶层当中也有类似情况。^⑤ 陈硕与龚启圣利用方志等资料中的数据,研究了1796年至1910年间玉米引种的影响,发现它只是带来了人口增长,而城市化率和实际工资却随之下降了。为之前关于“哥伦布交换”的定性分析与假说提供了实证支撑。^⑥ 新史料和新数据的广泛应用,有利于提升研究成果的理论水平和现实价值,为经济史研究夯实了原有基础,给经济史学科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上述三大趋势下广大学者通过不懈努力形成了一批优秀学术成果。这些研究既注重从制度与思想等较为宏大的视角研究经济发展,同时也重视以微观视角从宗族、行会等社会组织角度来研究社会经济制度是如何运行的。这些趋势在近来的一些学术会议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2016年9月举办的第二届“上财经济史学 Workshop 暨制度、思想、社会组织与经济发展研讨会”,这次会议由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与《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共同举办,来自美国斯坦福大学、耶鲁大学、科罗拉多大学波尔得分校、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香港中文大学、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60余位海内外学者共同参会。会议论文集集中体现了运用新史料、新数据和跨学科的方法,在全球视野下对长时段中国经济史展开研究的趋势。

① Bozhong Li, Jan Luiten van Zanden, “Before the Great Divergence? Comparing the Yangzi Delta and the Netherland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72, No. 4, 2010, pp. 956–989.

② [英]约翰·希克斯著,厉以平译:《经济史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4页。

③ 林满红著,詹庆华等译:《银线:19世纪的世界与中国》,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④ 科大卫著,卜永坚译:《皇帝与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⑤ Carol H Shiu, “Human Capital and Fertility in Chinese Clans Before Modern Growth”, NBER working paper No. 19661, 2013.

⑥ Shuo Chen, James Kung, “Of Maize and Men: The Effect of a New World Crop on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Vol. 21, No. 1, 2016, pp. 71–99.

与以往关注较多的微观史学专题研究不同,本次会议的大部分论文都聚焦于长时段的经济发展进程,例如美国斯坦福大学格雷夫(Avner Greif)教授基于中欧比较的视角分析了近千年来中国宗族和企业的发展进程,用比较历史制度分析的方法考察了文化与制度的共同演化如何导致了中国与欧洲的制度演进路径差异。他提出具有自我认同的个体组成的团体是合作的基础,这样的团体所具有的道德约束减少了执行成本,使得追求群体性行动有比较优势。这种团体内部的忠诚性影响着制度演化的方向。在中国,这个团体主要是基于血缘关系的宗族,而在欧洲主要是行会这种带有“法人”性质的团体。由于数据的限制,以往研究中国历史上的宗族问题多是采用案例分析或进行定性描述。格雷夫教授与上海财经大学燕红忠教授合作整理的中国家谱数据库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数据不足的缺憾。利用数据库,格雷夫教授对中国宗族的起源、迁徙、发展等方面进行了细致分析,为其制度演化的模型提供了可靠的数据支撑,使研究更加深入。美国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关于君权制度变迁的东西方比较分析,是基于历朝皇帝命案与任期的量化历史研究,通过对从秦朝建立到清朝灭亡的皇帝在位情况的数据整理,认为中国皇帝非正常死亡概率比同时期的西欧高出近两倍,并且下降趋势来得晚,下降速度更慢,从而影响到了历史时期的生活水平和经济总量等。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波尔得分校薛华副教授通过整理1298—1925年的安徽桐城家谱数据,关注了1300—1900年间中国的代际社会流动现象,认为在这一时段内社会流动性是渐趋增加的,而社会流动性的改变在不同收入水平的人群间也是不同的,社会流动程度与国民收入不平等程度成反比。此外,与父子等直接的亲缘关系类似,叔侄或翁婿等关系与社会流动性也有着显著关联,这应当引起学者对于家庭边界的概念的重新审视。复旦大学韦森教授探讨了货币的起源及演变过程,从亚里士多德、洛克、亚当·斯密、马克思、穆勒等思想家和古典经济学家的货币学说出发,阐述了货币的本质,同时引入了以往关注较少的经济学家麦克劳德、凯恩斯、熊彼特等的货币债务属性说。与商品货币观有所区别的是,这一派学者认为货币是可转让的债务,大大拓宽了人们对于货币本质的理解。他认为市场价格是一个货币标量,有价格必须有货币,但货币并不是影子价格。货币的本质来源于债务的观点,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今宏观经济形势、货币供给量和金融业发展状况。

在长时段的经济史研究中,大多运用了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方法,这一特征在本次会议上也得到了充分体现。香港中文大学科大卫教授运用文化人类学方法,在经济发展中引入文化因素,认为孝道就是信用的体现,祖先带有现代意义上“法人”的意味。祠堂以祖先的名义控制财产,对公共资产进行管理。祠堂是以同一个祖先的子孙为原则的,如果不是,人们就会往前追溯直到找到一个共同的祖先,用共同的祖先来登记。这样祠堂就变成股份公司,祖先就是法人,其后代都是股东。祠堂在中国“公司”的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斯坦福大学的苏成捷(Matthew Sommer)教授关注了清代普遍存在的“卖妻”现象,基于大量档案文献,他认为“卖妻”是由于贫穷所引发的一种普遍的生存策略,这种行为具有广泛的市场,而且被农村社会的贫民阶层普遍接受,这反映了非正式的习惯逐渐取代了正式的规范。尽管理论上这些违法行为均应遭到处罚,但是官员很少严格地执行法律,而是更尊重被侵害的妻子一方的意愿。而这种官方的立场不仅可以被解读为政府机能的失调,也是社会和经济问题的一种应对策略。卖妻行为实际上也是传统中国“厚彩礼”婚姻行为的一种表现方式。上海财经大学杜恂诚教授探讨了中国近代经济发展中的成文法与习惯法,认为晚清和北洋时期的成文法是与习惯法互为依存的,而旨在推行统制经济的南京政府所制定的成文法,表面看似乎在追求经济领域的公平,实际上却阻断了市场主导的习惯法过程。华中师范大学魏文享教授聚焦于近代天津的商人团体在所得税征稽中所扮演的角色,他论述了1936年国民政府开征所得税后天津商会和同业公会在协征和抗诉之间的处境,反映了商人团体在与政府互动过程的积极作用,同时由于与政府力量差异悬殊,商会和同业公会处于极为尴尬的地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高超群研究员从观念史的角度研究了中国近代企业的起源。他认为实业并不是一个西方的概念,而是中国人“杜撰”的,实业的

内涵也包含着众多的中国特色。在1900年前后,中国人的观念和知识体系发生了巨大变化,企业的边界随之扩展,“企业”一词也在20世纪初出现,并很快流行。因此,在思想史中从“商”到“实业”的转变,从企业史的角度而言,也就是中国近代企业产生的过程,而中国传统在近代企业的产生过程中始终在发挥作用,只是在不同历史时期方式不同而已。福建师范大学林立强教授综合运用了管理学、宗教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探讨了民国时期企业主信仰基督教的情形以及信仰后对企业管理所产生的影响,他指出,企业家将基督教作为“私人信仰”和将其转化为“公司信仰”对于企业经营管理的影响是不同的,宗教信仰对于政商关系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对当今企业管理有重要启示。

新史料的挖掘和新数据的应用为长时段经济史研究中提供了助力。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马德斌副教授利用数据与模型提出并解答了中国财政史上的一个悖论,即中国政府对于财产以及个人拥有很大的权力,但并没有因此将这种权力转化为较西方更高的财政收入。他指出:中央政府也不能要求税吏征收重税,否则会激励税吏对农民过度课税;同时中央政府也不能支付高额薪俸给税吏以此作为重税的回报。因此,对此问题的一种解决方法自然就是,为税吏提供较低的薪俸,征收较低税赋,但同时允许税吏向农民额外收取不在监督范围内的税款。美国斯坦福大学乔志健博士运用了大量碑刻资料,认为19世纪前夕呼和浩特兴起了不同于原有的“行”的新型商人组织,即一种由商人和手工业者创立的“社”,其社会经济功能与中世纪晚期和现代社会早期的欧洲行会类似,可称为“贸易行会”。“贸易行会”的优势地位帮助呼和浩特从一个军事基地转型为一个商业贸易集散口岸,从根本上改变了政府与商人的关系。呼和浩特“贸易行会”的兴起同时说明清政府的北部边陲并非封闭的地理单元,而是有着活跃的商业活动,并经历了独特的动态制度演进过程。上海财经大学燕红忠教授通过研究晚清捐纳制度与近代新式企业,探讨了制度与经济的关系。基于清代官员履历档案数据库,他的研究发现相对于官办企业而言,代表近代新式经济的民办企业是促进人们捐纳的一个重要因素。新式企业的发展和捐官对传统科举制度具有逐渐削弱的作用,但并不会直接影响实职官员的选拔和任命,这也支持了经济发展会对制度产生影响的观点。另一方面,因为捐纳的存在,科举在社会流动上的作用也会受到影响。该研究也为理解近代经济发展与官僚体制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微观视角,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对传统捐纳制度单纯地区化、事例性定性研究的不足。

这次会议充分体现了中国经济史研究国际化进程中的重要趋势。国外学者一向对于长时段、大视野的中国经济史及中外比较经济史研究较为关注,而历来注重微观研究的国内学者也开始与国际学术研究接轨,从而形成了当今中国经济史研究既重视长时段、大视野的宏观探索,又注重微观层面研究的趋势。与会者对于中国经济史的关注已经从单纯对于经济发展的考察,演变到对于制度、思想、社会组织等与经济的关系的研究上。这方面的中外比较研究,对于中外经济发展进程中的歧异与同化现象,有着较强的解释力,不但具有很强的理论价值,也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同时,在量化方法和数据库构建工作成果颇丰的当下,中外研究者已经不再盲目使用某些技术性手段,而是有十分明确的问题意识,坚持从问题出发,使用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方法;在对于史料的选取和数据的整理上,也日益严谨且颇有创新。以新史料、新数据、跨学科方法为基础,着眼于长时段、大视野的中国经济史和中外经济史比较研究,已经成为中外学者共同关注的学术重点。

(责任编辑:高超群)